

陳正毅訪問記錄

受訪時間：2013年9月25日

受訪人：陳正毅先生

訪問人記錄：邱家宜

受訪者大事記

出生	1952年5月4日出生於雲林縣北港鎮
學歷	1972年進入世新三專部編採科就讀，開始在《中國時報》等媒體發表小說及報導文學作品。同年與同學在校園創辦《世新周報》，主編副刊。1973年與同學創立「新聞人報社」社團，發行《新聞人》，主編副刊，同時擔任世新「文藝社」社長，結合兩個社團的力量，舉辦了「翠谷文學獎」。1975年世新畢業
經歷	1976年進《中央日報》後到退休前不曾換過單位，從台北縣記者，一路做到採訪組副組長、廣告組長、副總經理，1996年出任總經理，至1999年退休。退休後又到交大進修，以《媒體競爭策略探討-以大編輯台資源整合為例》論文，獲EMBA學位。 2000年至2007年間曾擔任東森媒體集團總裁（王令麟）特助及發言人，2007年因車禍受傷離職。 1979年小說集《下雨天》首度由皇冠出版社出版，1999年由九歌出版社再版。2013年7月，大腸癌轉移至肺、骨盆腔、頭腦等部份。病中，由昔日世新好友共同出資，出版《用生命書寫-一個新聞人的40年心路》文集。（資料來源：《用生命書寫》一書後附的「陳正毅年表」，以及該書中的部份相關內容）

遍看世間皆好意，從不後悔新聞人

一位新聞記者陳正毅(1952-2014)的人生故事

前言

訪問陳正毅先生做他的口述歷史，是應世新大學「舍我紀念館」的委

託，進行校友的口述歷史計畫。2013年9月25日下午，我在世新大學的翠谷餐廳與陳正毅談了約兩個小時，已經癌末的陳正毅那天精神相當不錯，他以一貫謙和的態度稱呼我為「邱博士」，對於訪問中所談到的人、事、物，即使有批評也多點到為止，充分表現出「口不出惡言」的溫和敦厚氣質，雖然飽經世故，卻顯得不與人爭。他在《用生命書寫》自選文集中，提到各方好友、故舊，總是滿紙揄揚，對於那些曾經有負於他的，則輕描淡寫，不忍深責。我感覺這種和煦、謙虛，對一個飽受喪偶之痛、病魔摧折的人來說，真是難得境界。

訪問內容在經過錄音整理，並經陳正毅本人生前的兩度以電郵校訂、確認之後，已經於2014年6月送交舍我紀念館典藏。以下這篇傳記文字，則是作者應傳記文學溫玲溢總編輯之邀，根據這篇訪談內容，以及陳正毅的兩本著作《下午天》、《用生命書寫》中的資料所完成。*作傳的用意除了為一個一生認真的新聞記者留下一些生命鴻爪，也希望能從個體生命的記述，映照出某些時代的光影與痕跡。

甘蔗田裡成長的文藝少年

出生在戒嚴時期的台灣雲林，不像大部分的鄰居孩子們習慣赤腳嬉戲，總是習慣穿著拖鞋的陳正毅，小時候是安靜而孤獨的。他很喜歡閱讀。沒有書香世家的薰陶，他最早的文學養份，來自在糖廠工作的父親案頭的《東周列國誌》，以及父親嗜好的武俠小說，看得著迷，晚上拿手電筒蒙在被子裡看。外祖母家在北港街上開理髮店，訂給客人看的各種報紙、雜誌他抓到就看，北港地區「民眾服務社」(國民黨地方據點)大廳中陳列的各種報刊，也經常讓他流連。這種彷彿野生的「雜食」性閱讀顯然養分不小，成長到青少年時期的陳正毅，已經是家鄉小有名氣的文藝青年，曾代表就讀的興華中學奪得嘉義縣高中作文競賽首獎，並經常投稿《青年戰士報》(後改稱《青年日報》)的「青年園地」以及「學府麟爪」專欄(2:43-45)。

* 本文非學術體例文章，原本不設註腳。但為讓有興趣追索的讀者有所依據，文中凡引用兩本著作內容部分，以括弧內阿拉伯數字簡單標示，以“1”代表《下午天》，“2”代表《用生命書寫》，冒號後面的阿拉伯數字為頁碼，引用自2013年9月之訪談資料的，有的在行文中會註明，未有註明，而以引號、方括弧直接引用陳正毅本人說法的，也都出自訪談資料。相關事件的時間點考據，除根據以上三種資料，也參考《用生命書寫》最後所附的〈陳正毅年表〉。

高中文藝青年瘋辦校刊，正規的學校課業自然難以兼顧。在嘉義天主教輔仁中學讀了兩年，高三轉到興華中學，與詩人渡也等一批地方浪漫文青一起辦起同人文藝雜誌《拜燈》，只出了創刊號一期，就因為文友們讀書、就業各奔前程無疾而終了(2:24-26)。1972年進入世新三專部編採科就讀，讓他文藝青年的血液以恣意沸騰，經常帶著饅頭跟水，爬上學校後山仙跡岩，寫稿鎮日後下山郵寄投稿各大副刊。擔任世新「文藝社」社長之餘，又跟沈守訓等志同道合的同學自己籌款合組《世新周報》，跟校方出版的《小世界》打起對台來。後來校方將《世新周報》與原有的兩個學生社團刊物《世新時報》與《記者報》合併改名《新聞人》，成為台灣眾多新聞專業工作者的育成園地(2:161)。

陳正毅在文學寫作上的早慧，從收錄在《下雨天》一書的作品中可以明顯看出來。當時才二十出頭歲的陳正毅，短篇小說已寫得相當具有功力。當時正是台灣「鄉土文學論戰」即將開始的前沿階段，他的小說經常以家鄉北港為背景，刻畫社會底層小人物的悲歡，鄉土味十足，無怪乎「鄉土文學論戰」的重要旗手，《中國時報》「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對他賞識有加，一直想找他一起編副刊，也主編過「人間」副刊的金恆煒，曾對他開始當記者之後來即不再寫小說表示過惋惜之意。文藝青年後來雖改行當了新聞記者，但在談記者陳正毅之前，不能不先談談作家陳正毅。

由皇冠出版社出版的《下雨天》，是陳正毅唯一的短篇小說集，書中所收錄的十三篇短篇小說加上一篇文學式報導，均完成於1973-1975年間他在世新讀書的階段，但直到1979年結婚前才集結出版。十四篇作品中有七篇原載《中國時報》「人間」副刊，其餘則曾分別發表於《台灣時報》副刊、《中華日報》副刊，以及校園刊物中(1:191-193)。

來自鄉土的文學養分

在這些作品中，〈春寒〉的情節整個是以北港媽祖出巡繞境為主軸，描寫一個在媽祖廟旁開店執業數十年，虔誠信仰媽祖的老中醫，面對以信仰為中心的淳樸小鎮日漸被霓虹燈招牌等商業化市容佔領，心中的感傷與無奈，讀起來頗有羅大佑「鹿港小鎮」(1982)的北港先行版的味道。

〈大本乞丐〉是篇幅最長的，已經接近中篇小說規模，內容描寫北港

媽祖廟附近，被眼盲的乞丐媽媽生下來，天生就是乞丐的阿福的故事。母親在阿福還小的時候便失足落水溺斃，小阿福沒報戶口、沒有戶籍、身分證，當然也不會有人叫他上學識字。幼小時惹人同情憐愛，容易求得施捨，青壯之後便常遭人白眼唾罵羞辱，阿福也曾經想要找工作靠勞力賺錢，但在家鄉因為沒有身分證、不識字，且人人皆知他為乞丐而碰壁。跑到大都市高雄想謀發展，好不容易找到為載豬車當捆工的工作，做了幾年，有一次跌落車下膝蓋受傷，只好再回家鄉乞討為生，並一心一意虔誠信奉媽祖。故事的結尾，阿福因為結為忘年之交的小男孩竟然溺水而死，對原本一心信仰的媽祖心生怨懟，陡然興起夜裡放火燒廟的念頭，結果被廟公當場發現並誣陷為偷媽祖金牌的小偷，打鬥中又一凳子打死了一個廟公，在被警察帶走時，他心裡想著一個乞丐同行曾告訴他的話：「乞丐是沒有神明的」。

阿福的故事很讓人低迴同情，除了以北港媽祖廟的宗教氣氛為襯托，作者在文字中所留露出來的，對社會底層邊緣弱勢者難以翻身的同情，讓人聯想起老舍筆下的〈駱駝祥子〉。小說集中對社會底層人物的描寫還有〈某種人生〉、〈桂花〉、〈一把晶亮的銀幣〉，其中又以〈某種人生〉最工整、純熟。故事描寫鎮日隨車南北奔波的卡車捆工金旺，某天遇到車子進場維修，買了豬腳、香蕉回家與妻兒團聚的場景，望著兒女爭食香蕉、猛啃豬腳，他一再感覺自己無法改變的貧窮，但仍將翻身的希望寄託在下一代身上。〈返鄉〉與〈下雨天〉兩篇，都描寫台灣農村女孩的人生故事。前者反映台灣社會早年普遍的養女現象，養女為家庭犧牲墮入煙花，蕙質蘭心無限酸楚；後者表現農村人口向都市流動，離家工作，寄人籬下的少女想念家鄉父母的心情。冷調的筆法相當細膩、生動。

在這些作品中，「失鄉路」的題材最特別，描寫台灣日治晚期，嘉義農校青年學生被徵召接受軍事訓練(學徒兵)，一位家境富裕、資質聰穎，受到師長厚愛的台灣學生，在訓練中染患瘧疾不治身亡，同袍好友受長官之託將其骨灰送回家鄉北港，卻發現他全家人都已經被炸死在防空洞中的故事。根據陳正毅在小說集另一篇作品「河邊骨的回響」中的記載，這個故事脫胎自他家族中一位英年早逝的堂叔，而故事中受託帶骨灰回家的那位青年，就是以他自己的父親為藍本。他從小在家中老宅正廳牆上，經常看到年輕四叔的遺照，排列在歷代祖先蒼老的容顏中，顯得特別的醒目，讓他從小便對台籍日本兵的故事充滿好奇。小說人物中，有一沉默寡言的「森

田排長」(也是學徒兵們在當學生時的森田老師)，對學生相當愛護，因為死去的青年酷似自己日本家鄉的兒子而對他更是關愛有加，是一個相當正面的角色。

陳正毅出生在 1952 年，距離日本殖民統治結束不過短短七年，但陳正毅這種對日治台灣的陌生並不是特例，反倒可以說是深具代表性的。台灣經歷過日本殖民統治五十年，但為了不干擾國府重塑國族認同敘事軸線的清晰，這段歷史在戰後及國府遷台後的正規教育體系中，被刻意的忽略。這條被刻意藉由國民教育中國語、歷史、地理、公民教育等科目所凸顯的台灣是反攻大陸復興基地的未來式國族認同敘事軸線，與日本半世紀統治所產生的錯綜複雜影響，關係自然越少越好。於是甚至連台灣人在殖民統治下所受的痛苦也多是一筆帶過，不交代細節，因為細節往往容易曝露真實。像〈失鄉路〉這樣的寫作題材，在 1970 年代初期的台灣恐怕還嫌太過突兀，尤其像「森田排長」這樣的角色呈現。或許作者本人也有這樣的自覺，當時並未將此篇投稿報紙副刊(1:193)。

是誰在寫近代史

小說集中唯一的非小說〈河邊骨〉是陳正毅為「人間副刊」的「現實的邊緣」專欄所寫的，接近當時開始流行的報導文學體的作品。當時台灣民間有人發起向日本政府追討當年台籍日本兵存放在日本軍郵中的薪水存款的運動，陳正毅因為對台籍日本兵懷有特殊感情，決定要對此事進行採訪與報導。這篇描述台籍日本兵被徵召到南洋戰場當軍伕，歷盡人間煉獄，十去九無還的戰爭悲劇在「人間」刊出後引發極大回響，許多讀者紛紛寫信將自己家族成員的類似遭遇說出來。一位住台北士林區的修路工人在寫給陳正毅的信中提到：「像『河邊骨』這樣的史實，在我的見聞裏，算不清，講不完，為什麼平常卻鮮少見人提起呢？這大概是寫作大人太過於向上展望，向外追求，而忘了向下看看往自己的歷史與文化裏看看吧？」(1:186-187)在 1970 年代初期的台灣，日治時期的歷史經驗仍清晰地存在於台灣常民生活的記憶中，卻奇特地幾乎欠缺於所有的公共論域，陳正毅的這篇報導，彷彿為當時這些被封印的記憶開了一個缺口，因此引發了一場不小的騷動。讓他不得不應「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的要求，又寫了〈河邊骨的迴響〉，來回應不斷湧入的讀者來信(1:190)。

在這篇也收進小說集的迴響文章中，陳正毅談到了他自己所受的歷史教育：「當時在念中國近代史時，幾個朋友像林清玄、沈守訓、劉燦榮、詹翹等的考試成績都不理想，並不是我們不懂近代史，可是實在唸不下那頁血淚斑駁的先人腳跡，尤其是劉燦榮，他考近代史時竟在考場裡面掉下了眼淚，這是我極難忘懷的一個影像。...進入世新，有幸遇著良師益友，在這一方仙跡岩圍繞成的學園裏，我對自己是中國人這一個事實有更深一層的認識。」(1:188-189)他在世新讀書時正逢台日斷交(1972年)，陳正毅跟他的熱血青年朋友們，買了整籃雞蛋去丟日本特使椎名悅三郎，還好幾次從木柵溝子口走路數小時到濟南路日本大使館去通宵抗議。如同1983年決定「回歸祖國」的侯德健，陳正毅這一代的台灣青年，在歷史教育中所培養的正是像「雖不曾見過長江美，夢裡常神遊長江水；雖不曾見過黃河壯，澎湃洶湧在夢裡」這樣直接、熱烈的，對等待重回中華民國懷抱的祖國大陸的奔騰情愫。陳正毅或許並不知道，他自己因為家族記憶與早年生活經驗，對台籍日本兵記憶所展開的挖掘，其實正是國府當局有意簡化台灣的集體歷史記憶，而刻意迴避掉的部分。

陳正毅因為身上所帶有的濃厚的鄉土氣息，以及展現與台北都會大異其趣的生活經驗的文字能力，而受到「人間」副刊高信疆與金恆煒的賞識，但他最崇拜的文學家卻是當時文壇上的「反共文學」祭酒朱西甯。他在世新讀書時，經常跑到朱西甯位在興隆路山邊的家中「跟大夥兒一道聊小說、聊五四的和抗戰的文學」(1:3)，他唯一的小說集就是請朱西甯做的序。2011年他在病中仍為《人間福報》寫專欄，還特別用〈青海浩瀚〉為題，追憶跟朱西甯的這段師生情誼，孺慕之情不減當年(2:33-36)。另一個影響他的，是當年在「鄉土文學論戰」中與高信疆打對台的《聯合報》副刊主編痲弦，他在引用余光中對痲弦的品題為名的文章〈天鵝上岸，選手改行〉(2011.05.03《人間福報》)中，提到當年他在世新辦「翠谷文學獎」時，就經常向當時編《幼獅文藝》、主辦救國團「復興文藝營」的痲弦請益。進入中央日報當記者後，也經常到同住永和的痲弦家串門子(2:21-23)。從系譜上觀察，朱西甯、痲弦都是政戰系統出身的軍系作家，黨國立場堅定鮮明。從陳正毅在請益對象上的選擇，多少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的傾向與態度，但與其說是有意識的選擇，不如說是他所處的時代與環境對他的塑造。

他從少年以來即連結著祖國懷抱的俠情與詩心，也充分表現在他為當

年「神州詩社」文友溫瑞安《今之俠者》武俠小說集再版作序的〈帶劍書生〉中寫道：「那是在木柵試劍山莊，溫瑞安領頭的神州諸君子擊節高唱社歌，一聲一捶，把酣睡的青龍擊痛了，那痛是一種被擊的惶惶，使我看清楚海盡石枯之後潛龍的無依。為什麼〈滿江紅〉會有這種凌霄而上的怒氣、高節，同樣的詞、同樣的曲，為什麼能唱得那樣勁烈激昂？」(2:152) 沉睡的青龍、等待收復的大好河山，具是戰後到 1960 年代中期之前出生在台灣的人，腦海中被塑造的共同歷史記憶與圖騰。

幾次與言論戒嚴有關的經驗

即使滿溢著年少的輕狂與叛逆，現在回顧起來，陳正毅跟他的朋友們，基本上並沒有逾越大環境的規範與限制，但在當時非常緊縮的政治氛圍中，也曾出現過幾個擦邊球。最早一次是讀高中時，因為經常投稿《青年戰士報》的「青年園地」，結交了南北的一批文友，有一次大家決定到嘉義蘭潭大會師，約好在嘉義火車站，從未謀面的文青們相約手裡拿著《青年戰士報》做為記號，共有七十幾個文友赴會，當時還是民國五十幾年的戒嚴時期，這種文友大規模聚會，自然引來治安單位的關切。發起人陳正毅才剛把標示集合點的牌子舉起來，人就立刻被帶到警察局，他在受訪時描述當時現場的情形：「少年組開著卡車，還是軍車，要來抓人，結果一看，怎麼好像都很斯文。我說我們是文友，後來他們帶我去警察局偵訊完就放我走。我去蘭潭主持活動，他們就在旁邊監視。」雖然學校去把他給保了出來，警方也讓他繼續參加文友們的聚會活動，但讓他第一次感覺到「白色寒冷」(2:44)。學生聚會鬧上警察局，他所就讀的學校當然不會高興，期末成績單上被老師批了個「剛愎自用」。另外一次也是文青行徑惹禍，他跑到雲林三條崙海邊與文友在海邊散步，結果卻被海防守軍留置盤查。他在訪談中回憶這段往事：「三條崙在雲林海邊。我們只是走來走去，看夕陽。他們以為我要偷渡，我說我不會游泳啊，要偷渡也要技能。後來當地的老師請校長來幫我保出來。」

在世新讀書時瘋辦報紙，年輕人如何知道天高地厚，往往筆下揮灑不知收斂。當時的台灣文字獄時有所聞，世新有多位老師曾言論惹禍。校長成舍我擔心學生報紙出紕漏，要求學生刊物的社論或敏感文章須由他親自用放大鏡看過才准出刊，老校長審稿速度慢，經常出現學生為了趕出刊先

偷跑送印，結果稿子不通過，必須重印的情況。陳正毅跟朋友們所辦的報刊，主責幹部常被校長約見開導，即使如此，在那個風聲鶴唳的年代，還是有幾次被情治單位關切，都是由成校長力保才得以過關(2:161)。不過陳正毅的「犯禁」生涯到世新畢業為止，在他接下來的人生中，如何妥協於現實成為最大的考驗。

新聞記者陳正毅

對於年少理想的落拓，陳正毅在畢業出社會之後曾經這樣描述：「這種日子沒甚麼好也沒什麼不好，彷彿這樣定下來安身立命，把闖蕩江湖快意恩仇留給史冊及武俠小說，反正事不干己，事不干己呵！即使在吟唱著「江南游子、把吳鉤看了，欄杆拍遍，無人會，登臨意」，也是當它做藝術，不當做生命的熱血澎湃。武，已是道館或者演藝場的事了；俠，更是渺渺乎難尋。和大部分人一樣，我們成了「忍術」高手，能屈能伸，但非本心，而是依外力來決定我們的彈性，你強，我退一步，如不犯我，則大可作壁上觀，保得一身太平。縱有路見不平之心，也乏拔刀相助之義。」(2:151-152)他在為昔日文友溫瑞安의武俠小說集《今之俠者》作序時所做的這番告解，相當程度預言了往後的人生境況。

1975年世新畢業，1976年陳正毅就考入當時人人稱羨的《中央日報》當記者，從此開始他與世浮沉的記者生涯，主跑過的路線包括台北縣地方新聞、機場、影劇、農業、科技(2:67-68)，他不口出惡言的隨和性個，讓他到處結交朋友，記者同業要組聯誼會，他總是會長的不二人選。因為主跑的都不是與政治意識形態相關的黨政、國會路線，所以較不必涉入近三十年來經常佔據新聞舞台中央的藍綠、統獨等政治敏感議題，讓他得以「政治免疫」。因跑文藝、影劇路線與研究台灣戲曲的邱坤良結為好友；跑財經路線時也與李模、陳朝威等人友善；一方面在國民黨黨營報社任職高層，一方面又積極參與台灣本土色彩濃厚的台北永樂扶輪社，似乎毫不衝突。

陳正毅在整個記者生涯中只待過《中央日報》一個報社，這在新聞圈中是比較少見的。從1976年考入該報到1999年退休，在《中央日報》總共服務了24年，中間曾經歷過一段低潮，那就是1986年開始，他被社長

石永貴調到廣告部門做業務。石永貴大概認為他跑過財經，對跟企業界打交道較有概念，雖然在職務位階上是調陞，但這對向來以文人自居的陳正毅可是一大打擊，他在接受口述歷史訪問時，以「痛哭流涕」來形容自己接到派令時的反應：「我是文人出身啊！我喜歡當文人啊！不太能接受和金錢為伍的工作。覺得毀了，這輩子毀了。」但這麼大的打擊，生涯這麼重大的轉變，他竟然也承受下來了。他在訪問中透露，其實當時已經當上《工商時報》總編輯的業界好友鄭優，原本有意請他過去擔任自己的特助，但最後事情沒又談成，於是他便成為《中央日報》在面對 1988 年台灣報禁開放，對黨營報紙造成嚴峻挑戰局面下，廣告部門的主將。而且還做得相當有聲有色。

嫁雞隨雞、從一而終

問他當時為什麼不向長官抗議，陳正毅受訪時淡淡地說：「我沒有反彈啦！我的個性比較柔性。我就靜靜的。我在《中央日報》每三年就會調個位置，連調到廣告組，我也只是嘆口氣。」其實早在鄭優之前，他剛到《中央日報》時，《人間副刊》的高信疆就找過他，高信疆從他在世新讀書時就一直很欣賞他，希望找他去編副刊，但他沒有答應。他描述高信疆硬要挖腳他的狀況：「他叫我寫辭呈，我說我不會寫，他說我唸你寫。」結果他還是沒有去。顯然在當時，新聞記者的工作，對他是相當具有吸引力的。1978 年聯合報系的《民生報》創刊，副社長石敏請他過去擔任省政特派員，當時連人事命令都發布了，但因為跑省政必須遷居台中，他當時與母親在板橋開了一家小雜貨店，因此覺得無法離開台北。他描述自己的這種性格：「我的個性就是很奇怪，很被動。...有點像以前的女人，嫁給一個男人，不怎麼理想，但是理想不理想，嫁給他就嫁雞隨雞了。」

雖然都是在報社工作，但跑新聞與作業務的工作性質天差地別，他從跑新聞轉為賣廣告，在當時政治解嚴、報禁開放，新報紙搶食廣告大餅的慘烈競爭環境下，他竟然也讓《中央日報》的廣告業績維持了相當的局面。當時在《中央日報》擔任總經理的賴明佶，在為陳正毅的第二本書《用生命書寫》作序時就提到，原本大家都不看好陳正毅這個文人去做廣告業務，沒想到他認真投入、屢創新猷，讓大家刮目相看(2:3-8)。從組長升任經理，再升任總經理，但客觀大環境畢竟使得《中央日報》的廣告經營日趨困難，

業績衝到一個程度，就不太容易再往上。

唐盼盼接石永貴當《中央日報》社長，剛開始不了解狀況，對廣告業務的表現不滿意，於是把當時已經升任副總經理的陳正毅又調回編輯部主筆室當撰述，兼專欄組組長，相當於副總編輯層級，重回自己的文字本業，讓陳正毅簡直「如釋重負」。

雖然不喜歡做，但他還是認真的做，也很在意自己在廣告業務上的表現是不是被肯定。對於把他調回編輯部的唐盼盼，他在訪談中提到：「等到他做過社長，發現報社業績一直在往下掉，他才知道，那個工作有多辛苦，真的是在撐著、撐著、撐著。他才知道當年他把我換掉的時候，廣告業績雖沒有成長，但我已經是非常努力在做了，於是就補發了一筆獎金給我。」陳正毅也意識到自己有這種能夠「忍辱負重」特質，他說：「對啦、對啦！我的個性一向如此。就像當時在辦《新聞人》的時候，沈守訓忙外務，我負責看家，有時候真的會很無助。因為錢用完了，印刷廠來催款……，很多事應該由發行人或社長來決定的事，可是找不到人，只好我自己先處理掉。」但如同遇人不淑的女子雖決定從一而終，但結果卻未必理想一樣。1990年當陳正毅再度從編輯部調到業務部擔任副總經理時，《中央日報》的營運已經是江河日下，從報禁解除之後的大舉擴編，到後來不斷縮編，1996年他升任最高行政職，擔任《中央日報》總經理，三年間，簽了一大推的

離職同意書，他在訪談中回憶：「我每天都在簽同意離職，簽多了，心軟了，心寒了。在最後一天五月三十一日下午五點半，我把自己也簽出去，自請離職了。」

加入東森集團與被逼退

不到五十歲就從職場退休，畢竟是太早了，一向忙碌慣了，對賦閒在家的生活適應不易，他除了去交大讀了一個EMBA，因為在企業界、媒體界朋友不少，2000年受邀加入擅長政治公關的東森集團，擔任總裁王令麟的特助兼發言人。他自承在東森集團並不核心，任內處理得最多的，是王令麟父親王又曾的官司，新聞浪頭上，經常必須面對媒體的提問，在東森集團工作的日子，以一場車禍意外收場。2007年他在下班途中，被一

輛酒駕車撞傷，頭顱開刀後因為腦部異常放電，出現癲癇症狀，被剛剛易主的東森集團形同逼退：「照勞基法，上下班時間都還包括在工作當中。所以如果我不走的話，他也沒辦法，就是需要養我啦。又回到我的個性，因為他們輪流來規勸我，要我不要堅持啦等等，最後我就自請離職。我自請離職了。...他就給了我幾個月啦！很有限的幾個月。他還跟我講說，你若不走，也不一定能贏啦，有點這個意思。其實，站在政府的法規來講，我堅持不離開大概也不會有問題。只是來跟我談的人，上下午輪流來跟我談的人，都是以前的老同事，我於心不忍啦，我覺得「相煎何太急」，也感覺沒什麼意思。當時沒想到，後來會缺錢。」 陳正毅對自己的老東家不願多作批評，但平鋪直敘的，聽起來也讓人心酸。

半被強迫地自請離職，同時失去健康與工作，心情自然鬱悶，透過舊有的媒體人脈，幫《人間福報》寫寫專欄，卻沒想到厄運還在後頭。2009年他被診斷出大腸癌，進行開刀、化療，隔年太太葉淑鳳女士竟然也發現大腸、肝臟都有腫瘤病灶，且經診斷為癌症四期，讓他們「陷入生命嚴冬」(2:94)。陳正毅早年的記者生涯「晚出早歸」，無暇顧及家庭，全靠太太持家，對髮妻接踵罹癌，心中負疚很深。葉女士在 2012 年四月往生，陳正毅在「祭妻文」中以台語發音文法，靜水流深、至情至性的寫著：「想起初戀彼時陣，你工作擱讀夜間部，每晚下課，從內湖返板橋。雖然很累了，還常到報社看我，雖然短短幾分鐘，但是咱真歡喜。...結婚後，感謝你媽媽的新厝借咱住，你又勤儉，自己也買厝，這個南部人才也當在台北站穩。...你返天國前，我要再說：『淑鳳，我愛妳！』雖然人的壽命有限，我對妳的愛是永久不變。」(2:100-101)兩年後的 2014 年四月，陳正毅隨其夫人之後返回極樂。

順流而下的殞落

當初被文壇超級伯樂高信疆視為千里馬的青年陳正毅，在多年後緬懷愛妻的短信中，字裡行間彷彿又可以發現當年的熠熠微光。他一生經歷了台灣戰後整個政治社會轉型，戒嚴、白色恐怖、民主化浪潮，在時代的湍急水流中，陳正毅

在青少年與青年階段的幾番弄潮之後，似乎放棄與浪頭搏鬥，而選擇

了順流而下的道路。是性格，也是環境，兩者加起來便成為人的命運。他從《中央日報》興盛的階段做到它夕陽西下，以文人的自覺委身業務勞形。這種委屈又繼續跟著他進入聲名狼藉的東森集團，為後來將車禍受傷的他棄之如敝屣的集團霸主效命。畢竟，不論義或不義，依附既有權勢，順流而下成，是比較省力的處世策略。如他曾經自嘲的，成為能屈能伸的「忍術」高手，為求此身太平，縱有路見不平之心，也乏拔刀相助之義了。

這裡記述的，是一個新聞記者陳政義的生命故事。從這個生命故事中，可以聯想到那個時代的許多故事。有些人跟他類似，選擇了順流而下的道路，相較於逆流撞擊與毀滅的聲勢，順流的殞落似乎總是悄然無聲的。那些選擇逆流而上的人，其中沒有被激流吞噬的，便有機會站上了瀑布的頂峰。

每一個生命的殞落，都是一扇窗戶的關閉，關於他或她的謎題的答案，都將永遠消失在那些不再開啟的窗戶背後。既然永遠沒有答案，於是我們不妨猜想，在些紅塵滾滾的背後，或許他內在的文青靈魂從未死滅。就像他回憶少年時與周俊吉在玉井山間共馳鈴木一二五的情景：「因為我們確實知道，生命應該不等於繁重的功課加上親人的期望，...不斷企圖去突破那個格局，可是不知從那一點下手。...風在林梢在髮茨在獵獵勁響的衣領上，我們切開風牆就像利剪割繭，氣吞萬里如虎。然後鐵騎轉入玉井山道，路路面起起伏伏，兩側荒漠的丘陵上冒出一座座的碉堡。百年前英雄繫馬的地方，百年前壯士磨劍的地方，戍守的人呢？我們大喝長嘯，向這古戰場致最高的禮敬。」(2:150-151)